



风雨中的家国情怀：傅承得与沙末赛益诗作的比较研究

Homeland Sentiments Amid Stor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h Seng Titt's and A. Samad

Said's Poetry

陈咨誼

CHAN ZHI SHUAN

22ALB06504

指导教师：黄丽丽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风雨中的家国情怀：傅承得与沙末赛益诗作的比较研究

Homeland Sentiments Amid Stor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h Seng Titt's and A. Samad

Said's Poetry

陈咨誼

CHAN ZHI SHUAN

22ALB06504

指导教师：黄丽丽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Chan Zhi Shua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4
第三节 文献综述.....	7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0
第二章 历史记忆重构.....	11
第一节 513 的记忆重构	12
第二节 从 513 到茅草行动.....	17
第三章 意象的运用.....	22
第一节 数字意象.....	23
第二节 自然意象.....	26
第三节 人物意象.....	30
第四章 结语.....	34
参考文献.....	37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陈咨誼 CHAN ZHI SHUAN

学号：22ALB06504

日期：2025 年 9 月 12 日

摘要

本研究聚焦于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和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含羞种子》（*Benih Semalu*）两部诗集，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法和诗史互见的结合，从历史记忆重构以及意象的运用两个维度，探析两位诗人何以在政治抒情诗中表达对民族创伤的关怀。通过比较两位诗人对 1969 年 513 事件、1987 年茅草行动的刻画，剖析了事件的起因，及其对群体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求还原历史真相。研究亦以“数字意象”、“自然意象”与“人物意象”三类核心象征展开论述。傅承得愤懑且尖锐批判国家政策的不平衡，激情直白描绘马来西亚华社受政治压制，进而被边缘化的处境；沙末赛益则巧妙运用乡村生活和童年回忆的隐喻，突出国族的韧性和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憧憬。研究指出，尽管两者诗风截然不同，但皆以小诗形式抵制官方单一历史叙述，将个人创伤化为集体记忆。然而作品中也表现艺术上的局限性。傅承得的诗歌容易陷入悲观主义，且意象单一，而沙末赛益的诗歌则过于晦涩，或削弱其批判力量。这种对比，为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见解，展现两部诗集在诗坛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赶在风雨之前》、沙末赛益、《含羞种子》（*Benih Semalu*）、历史记忆重构

致谢

在撰写论文期间，诚挚感谢黄丽丽导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从选题的迷茫，到研究思路的梳理，再到论文的反复雕磨，始终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态度悉心引导。不仅给予高度的自由度，更在细节上严格要求，每一次的答疑解惑，都帮助我理清思路，让我对研究有更深刻的理解。

另外，感谢三年来曾教导我的各位授课教授们。在课堂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知识背景、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等，为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对论文完成大有帮助。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互相勉励的好友们。对于他们给予的陪伴和无条件信任，心中感激不尽。那些情感上的慰藉和鼓励，让我在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日子里，在面对困难时充满勇气。

第一章 绪论

政治是管理和组织社会事务的活动，核心在于社会契约的理念，以人们如何被管理，及管理者应遵循的行为准则。¹人们的生活与政治相联，无法脱离社会环境。政治不仅影响个人生活选择，亦塑造社会结构和运作。

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与政治有着复杂且紧密的联系。“诗历来是民族心灵状态的反映，是民族情感的天气预报图”²，既是个人与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历史记忆的承载。诗人通过诗歌表达个人经历和政治思考，运用独特的视野及文笔阐述观点。比喻和象征的运用，不仅可增强作品感染力，庞杂的政治议题也得以简约生动呈现。诗歌亦为集体记忆的载体，暗记重要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见证历史之余凝聚民族情感。

换个视角，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始于法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旨在跨越国界，克服单一民族或语言文化的限制与片面³，从而推动更全面深入的文学研究。早期的法国学派奠定了其中的“影响研究”基础，关注两种文学之间的纵向影响，强调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及历史背景。⁴学者主要分析文学作品间的直接联系，如作家群体的相互影响，或某文学流派介于不同国家的传播和演变。然而这也忽视了文学内部审美，未能充分考虑作品的独特性和其所处文化背景的复杂性。

¹ 曾维龙，〈政治抒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05。

² 王昌忠，〈诗歌政治写作的合理路向〉，《广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9 期，页 163。

³ 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页 89。

⁴ 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页 134。

1958 年，美国学派对此提出强烈批评，“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ies*）应时应势应运而生，标志着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转折。⁵美国学者认为，“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ies*）限制了比较文学的视野，故主张即使无历史关系的两种民族文学亦具比较价值，着重内在联系和共通性。“平行研究”主要比较两种或以上无任何直接关联的民族文学作品，揭示它们在题材、内容、风格或思想上的异同。⁶不仅关注作品之间的相似性，也重视其中差异性，强调文化间的对话与碰撞，揭示文学如何反映各自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为“平行研究”中延申的重要分支，强调跨文化和语言视角。⁷其核心目的在于揭示诗歌艺术的集体规律，考察各民族或国别诗歌在韵味、情感等特征的共性与迥异，关注语言、风格和主题的丰富性，从而展示其中独特性及依存结构。比较诗学突破西方中心主义⁸，透过多维视野促进文化交流，使各民族诗歌在更广泛背景下被理解。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与历史背景的诗歌，学者得以深入了解人类的情感与经历，揭示各文明在相似主题下的多样抒发，促进艺术间的相互融合与尊重。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为马来西亚两种重要文学传统。马华文学源于华人移民历史，不仅回顾了国家发展中华社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观，也为华人提

⁵ 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页 134。

⁶ 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西比较文学手册》，页 133。

⁷ 王宁，〈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9 年第 1 期，页 4。

⁸ 王宁，〈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页 6。

供自我认同的平台，寄托情感与思想。作家通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多样载体，描述了华人在移民、适应到安定过程中的纠葛，展现了华社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认同。

战后的马华作家逐渐意识自己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和政治参与，象征着华社“守护者”。此时的马华文学不仅表达个人情感，更深刻反思社会现实。作家以笔墨剖析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和社会边缘化等问题，揭示华人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努力维护华人文化和权益的同时反映对司法公正的祈望。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在作品中融入更多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意识，推动华人正面审视与认同自身身份。

相比之，马来文学扎根于马来文化，作品中常涵盖对自然的尊重、珍视传统和追求社会正义，反映了马来社会的历史、信仰与价值观。⁹殖民时期的马来作家在如英国等外来文明的影响下，不仅继承了传统马来文学，亦带动马来新文学的崛起和发展，积极保护本土文化的同时，抵抗殖民统治，深刻表达了民族独立的渴望。此时的马来文学成为独立运动中自信心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在推进非殖民化和建立民族认同方面，既是“捍卫者”，也是“推动者”。¹⁰1950年8月6日，马来文坛掀起一场重要的文学运动，19名马来青年作家在新加坡成立“五十年代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1950, ASAS 50*）”，提倡并发扬“为社会而艺术”的创作理念。¹¹这一代表性作家群体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为马来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多强调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并鼓励社会追寻自身的文化认同。

⁹ 赛·胡先·阿里著、赖顺吉译，《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0），页13。

¹⁰ 曾荣盛，《沙末赛益·马来西亚文学大师》（吉隆坡：馨艺苑，2016），页10。

¹¹ 曾荣盛，《沙末赛益·马来西亚文学大师》，页7-8。

华马文学的共存，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环境的必然，体现了社会的包容性与复杂性。两种文学形式在主题、风格和语言上的独特，反映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与冲突。马华文学侧重于华人社群的独特经历与文化认同，而马来文学则常常关注马来人的传统、习俗和社会问题。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文学创作，也为理解马来西亚的社会动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揭示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诗歌的抒情观可分为四点。其一强调“真于情性，发乎自然”¹²，即真实是艺术的根源，作诗须基于真挚的情感，方能打动人心。其次，诗歌应“抒哀怨之情，发幽愤之思”¹³，意味诗人应有感而发，表达对环境的不满和悲愤，而非无病呻吟。再者，创作应“有为而作，有补于时”¹⁴，强调诗歌应具志向和抱负，能对社会和政治有所贡献，传达积极向上的情绪。其四则为“含蓄蕴藉，哀而不伤”¹⁵，强调诗歌之美在于情感的含蓄表达，追求柔美与和谐，而非直接的悲愤抒发。

政治抒情诗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加入政治元素，以抒情手法评论政治，诉说家国之情。此诗体于 1950 年代涌现，比一般抒情诗更为集中，通常使用长句、错落的短句或阶梯式的句子结构，以具体而鲜明的形象、高昂的格调、奔放的气势、响亮的音节，体现出真实而强烈的激情与鲜明的时代和政治色

¹² 陈庆辉，《中国诗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页 21-32。

¹³ 陈庆辉，《中国诗学》，页 33-40。

¹⁴ 陈庆辉，《中国诗学》，页 41-47。

¹⁵ 陈庆辉，《中国诗学》，页 47-52。

彩。¹⁶政治抒情诗用直接触及时事的方式，展示社会生活，表现重大社会问题，并深入开掘其中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以达到发人深省的效果。故政治抒情诗是诗与政论巧妙的结合，是诗的政论，亦是政论的诗。¹⁷

本论文聚焦于傅承得与沙末赛益两位作家的政治抒情诗，主要研究文本为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及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含羞种子》（*Benih Semalu*）。通过对比两部诗集，探讨其中政治主题、情感表达和意象运用方面的异同，揭示双方在不同历史风雨下对社会政治的反思与回应。

傅承得（1959-）为马华文坛政治抒情诗的主要代表人物，于 1980 年代崛起。《赶在风雨之前》是其于 1988 年出版的诗集，并题之为“政治抒情诗集”，内容真实隐射 1980 年代马来西亚政治风暴，皆为当初国家政治状况缩影。¹⁸国家的民族制度一直处于不平等状态，马来西亚华人更身处政治旋涡中心，持续受到政治压迫。自傅承得 1984 年学成归国，至 80 年代末，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种族、党派等一系列课题，频现危机，¹⁹犹如风雨般侵袭华社而不得平静。

在绝望与孤愤的环境中，傅承得以诗为载体，介入现实社会与政治，将华族的忧虑不安转为文学作品。其运用较为浅白明朗的手法，以浪漫抒情的笔调讽刺、批判当时的政治局面，诗语言充满连绵忧患意识²⁰，望引起读者共鸣，并藉此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同时直言：“自我的最大希望，是时下感觉有心无力的华族青年，能藉这些作品发泄苦闷，进而激励振奋，教方

¹⁶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页 283。

¹⁷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 283。

¹⁸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88），页 1。

¹⁹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1。

²⁰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 288。

向明确、热血沸腾。”²¹故此作体现一个华裔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及政治问题的思考，将内心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及愿为华社不惜牺牲一切的情怀，倾注于诗里行间²²，冀望华人在风雨中能坚韧不拔并寻求克服之道。

沙末赛益（A. Samad Said, 1935-）为马来文坛资深作家，其创作主题尤多针对时弊和民生等社会课题，反映对社会现状的深切关怀。²³作为 ASAS 50 后期代表，沙末赛益始终秉持“为社会而艺术”的写作观，以自己的笔锋提笔马来（西）亚独立的历史变迁，深信文学是面镜子，映照人类在危机中的挣扎与抗争，细致记录每个灵魂在风雨中低语与呼唤的真貌。²⁴

其诗集《含羞种子》（*Benih Semalu*）（1987）独特且富有深度，由《希望的种子》（*Benih Harapan*）（1973）和《含羞草叶与野蕨心》（*Daun Semalu Pucuk Paku*）（1975）两部诗集汇编而成，共收录 45 首诗。²⁵诗人采用“小诗”形式、短而有力的语言，在有限的篇幅中传递丰富情感和深沉哲思。沙末赛益以细腻笔触和生动意象，结合战前至独立后的历史脉动，展现动荡岁月中个体的脆弱与坚韧，透过人性的复杂本能引发自身和族群存在的反思和理解。²⁶这不仅表达了个人情感，也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傅承得与沙末赛益皆为现实主义作家，政治诗均蕴含感时忧国情感，展现对社会的关切。两者诗作文字简洁明晰，时有讽刺笔调。傅承得注重个人情感抒发与社会关怀的结合，既表现强烈民族意识，又流露对时局的无奈与

²¹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1。

²² 陈大为，〈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页 13。

²³ 曾荣盛，《沙末赛益·马来西亚文学大师》，页 16。

²⁴ 沙末赛益曾表示自己的诗观为：“Kesusasteraan adalah laporan hidup daripada sisi krisis yang dihadapi oleh manusia”。引自 A.Samad Said, *Antara Bulan dan Wira: Edisi Khas Sasterawan Negar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2), 34.

²⁵ A.Samad Said, *Benih Semal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87).

²⁶ A.Samad Said, *Benih Semalu*.

焦虑。反之，沙末赛益的国家观念更为突出，隐晦地批判现实，文笔冷静平和，语气诚恳。在情感表达上，前者诗句直接而不失柔和，笔风如雷霆般震撼，语气激昂且情感真挚；后者则倾向于细腻含蓄的描述与隐喻，行文似水般温润。如此的格调差异使两者作品各具特色，展现不同的艺术张力和思想深度。

本文集中比较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和沙末赛益《含羞种子》两部诗集，分析其中涉及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归纳二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与批判，并从意象的运用上揭示其诗风的共鸣与差异。通过对比，研究可解析双方在政治表达和情感深度方面的表现，突显两者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视角，也反映其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研究结果强调了政治抒情诗在历史转折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其在社会批评和政治表达中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 文献综述

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比较研究整体上较为稀缺，尤以文学与政治历史交汇的研究领域更为罕见。现有的学术成果多聚焦于“后殖民主义”视角，着重分析两种文学体系何以促进跨族群对话，进而推动族群关系的形成。

在此研究中，庄华兴博士为代表学者。其在所著《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一书中的〈叙述国家寓言：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颀颀与定位〉提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本质以马来语为中心，由马来学术界主导政治和文化话语。其排他性的标准将非马来语创作排除在外，如马华文学被归类为“民族文学”。

为克服长期的边缘地位，马华文学必须通过跨文化实践和地方叙事，挑战单一的国家文学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其论文〈冷战在马来与马华文学场域的介入与冲击（1950-1969）〉则揭示冷战如何影响 1950 年至 1969 年间的马来和马华文坛，点出左右两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直接塑造文学辩论方向。冷战带来的分裂和文学斗争深刻影响两种文学的发展轨迹，并反映华马文学在共同历史背景下，对政治权力和文化认同的不同回应。

此外，黄丽丽教授在其论文〈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的跨族对话：从国族寓言的角度探讨〉中揭露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之间，如何通过互文性和象征叙事互相交融，共同反思多元社会中的民族政治、文化认同和权力结构。其另一篇论文〈1960 年代马来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后殖民话语〉则进一步指出，两种文学系统在 1960 年代通过创伤叙事、反殖民主题和寓言结构，共同构建马来西亚后殖民话语，展现殖民遗产中的权力动态和身份困境。

在具体作家方面，傅承得的《赶在风雨之前》专注于 80 年代马来西亚的政治动荡，虽此主题重要，然而相关研究仍十分匮乏。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一辑中的十首特定政治抒情诗，对其他诗篇的分析则相对不足。目前的研究者包括陈大为、许文荣、曾维龙、张光达和钟怡雯等。

陈大为在其〈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论文中，将研究分为预设的读者规模与效应、关于“月如”的叙述策略和“风雨”中的国家想象三个部分，深入解析傅承得诗歌的意涵与情感。其“菁英——书斋”的概念更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从而为傅承得的写作风格提供更深度解读。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中〈风雨中的一枝笔——有关傅承得及其政治抒情诗〉

一篇从“写实主义”视角，深入分析并解读傅承得的诗歌作品，并指出《赶在风雨之前》是 80 年代马华文学中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诗集。

马来文坛方面，沙末赛益的《含羞种子》在学界关注度极低，现无专门研究。故本文将其拆分为《希望的种子》和《含羞草叶与野蕨心》两部诗集进行阐述。然而，这两部诗集的研究也较为稀少，特别是针对于《含羞草叶与野蕨心》的研究。

Dharmawijaya 编撰的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2005)* 收录了沙末赛益自 50 年代起的作品，并记载了每首诗中诗人的简要心得与书写历史背景。曾荣盛《沙末赛益·马来西亚文学大师》则对其生平进行论述，并结合学者对沙末赛益及其作品的评价，使读者可从不同角度再次了解沙末赛益。再者，庄华兴编译的《月芽悬在西昆岩山颠：马来新诗选》收录并翻译了沙末赛益的部分诗作，为研究分析提供了便利。

其他重要文献中，Siti Hajar binti Zainuddin 的论文 *KAJIAN SEMIOTIK DALAM PUISI BENIH HARAPAN KARYA A.SAMAD SAID: PENDEKATAN TEORI SEMIOTIK* 探索了 *Benih Harapan* 中的符号学理论，讨论了诗歌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隐含与显性意义，以及语言象征的美学价值。同时，Abd Rahim bin Abdullah 的论文 *ANALISIS PEMIKIRAN PUISI A. SAMAD SAID & TAUFIQ ISMAIL DALAM ISU SOSIAL* 则关注于沙末赛益对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考察与经验，展现对族群命运的深切关怀。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篇论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作为研究方法，旨在通过精读和详细分析文本，深入理解诗歌的内在精髓。²⁷无论是马华文坛的傅承得，抑或是马来文坛的沙末赛益，两者诗风兼具写实与写意，运用丰富的文字与文学意象进行塑造，回溯历史印记。论文将特别分析傅承得的诗集《赶在风雨之前》，并与沙末赛益《含羞种子》中的诗歌进行比较。通过细读法，研究将揭示诗歌中的冲突与张力，从而全面把握其深层内涵。

其次，本篇论文亦以“诗史互见”为研究技巧，强调抒情与叙事结合对历史事件集体记忆与情感的形成，体现客观的“现实之知”与主观的“体验之知”。²⁸两部诗集皆通过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以简洁的语言凝炼重大事件，以写实的手法展现抒情性，并融入政治和社会范畴。诗作通过反映当时的情境，将抒情内容与历史背景交织，深化情感表达，从而揭示历史与情感的紧密联系，探讨作品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构建集体记忆。

²⁷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²⁸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页 280-285。

第二章 历史记忆重构

“历史”结合客观与主观，既是发生的事情本身，亦是对发生事情的叙述，也是事件统一发展的过程。²⁹历史记忆的重构与政治叙事息息相关，不仅再现过往时政，更是政治运动的再诠释。傅承得和沙末赛益通过政治抒情诗，将历史从单一官方国史，转为族群经历与记忆的情感载体，建构历史，展现历史面貌的多样性。不仅保存历史痕迹，保留并补充被边缘化的经验和被遗忘的细节，更揭示各民族何以在历史洪流中定位自我。

从政治视角而言，历史再现与重建本质上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群众是政治运作的根本，故历史叙述常常成为不同力量争夺话语权和构建合法性的舞台。马来西亚多元语境中的文学，对历史记忆的重构体现了国家对民族身份和合法性的辩护，还承载着不同社群对自身经历的表达与挑战。由于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对历史事件的集体经验和解读也存在显著差异——傅承得侧重于呈现边缘群体的生存与记忆，沙末赛益则致力于强化国家叙事，从而在多元立场中形成张力与对话。

²⁹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 101-102。

第一节 513 的记忆重构

陈平原认为，走入历史深处即通过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回忆录而“回到现场”。可几十年后的追忆，或许会因时光流逝而“遗忘”，就会被意识心态所“污染”。³⁰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与沙末赛益《含羞种子》（*Benih Semalu*）两部诗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书写，却共同以小诗形式为存档载体，将时代变迁下族群与国家的记忆嵌入文字中，使作品超越私人情感，成为集体历史的叙事与思索。

独立虽带来制度转型与民族自我认同，然而实际未完全摆脱殖民时期的不平等，社会矛盾依然若隐若现。随着上位者重新洗牌，社会资源再分配，国家再度陷入多重政治与社会危机。“历史重演”的担忧，让人民再次被推入不稳定与不安定的境地。1969 年的“513 事件”正是这种心理的具象化，族群间的张力骤然显现，暴露国家制度与认知层面上的整合不足。

沙末赛益的《含羞种子》是独立运动余波与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的文学见证。诗集中〈希望的种子〉（*Benih Harapan*）一诗里，数字“十三次”（*tiga belas kali*）极具暗示性：“旗柱十三摧/鹿温倏跛足——十三劫”。³¹旗帜被折断十三次，映射国家反复处于震荡之中，也让人联想 1969 年发生的社会冲突。诗人进一步写道：“有一秘录，湮沉于世/久未曾勘探，缄口不语”；“但，非所有书卷都坦白的注记”³²，揭示这段经历如长期被遗忘的历史伤痕，实则印证是对该事

³⁰ 陈平原，〈如何进入历史〉，《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9），页 61-63。

³¹ 原文“*dan patahlah tiang bendera tiga belas kali / kijang jinak serta-merta tempang — tiga belas kali*”。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详见 A.Samad Said, *Benih Semalu*, 8.

³² 原文“*satu khazanah yang terlalu lama lupa / diperiksa, dirahsia*”；“*Tetapi tidak semua buku bersih catatannya*”。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件的回应。诗人未直接复述细节，但通过诗句的层层暗示，仍能感受到那段时期民族的创伤与焦虑。

沙末赛益以“民主”(*demokrasi*)作为事件的起点，强调象征自由自主的民主，如同呼吸般自然地滋养着生活，民众皆可感受其存在。欢乐的时光在生活中流淌，人们享受着自己的权利。夜晚，歌谣不断回荡，仿佛在诉说着歌者的心声；而清晨，庆祝的气氛依然浓厚，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的一天。³³人民无忧地共享节庆的喜悦与生命的丰盈。然而诗人随即揭露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但人喊马嘶之声/刺耳尖啸/漠视如稻穀般蔓延，剥夺自我”。³⁴当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撕裂民主底下的理想化制度，混乱与失序便渗入日常，使人民原本对自由与团结的憧憬陷入破碎。

诗中对冲突爆发的描绘尤为生动：“旗帜于中心猎猎飘扬，祖业遗产断承/遂暂埋于尘间//继而旗柱十三摧”³⁵，表现国家团结的破碎。这场种族暴动破坏的不只是那艰辛升起的国旗，更葬送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人民的鲜血，成为政客维持政权的武器。³⁶诗的下句“鹿温倏跛足……航行的水手无法抵达彼岸”³⁷更强化冲击，形象传达了社会陷入失序后民众的无助与困境。人们仿佛漂浮在无边的海洋中，被汹涌的浪潮包围，却无法靠岸，象征集体在历史动荡中的迷失与无奈。

³³ 原文“*demokrasi ini bernafas, dan semua merasakan / musim nikmat / haknya, nyanyian yang tidak lena malam, / pestanya tidak lesu pagi.....*”。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³⁴ 原文“*tapi jeritan / yang terlalu tinggi dan / kealpaan merayap sekam merentap diri*”。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³⁵ 原文“*bendera di tengah-tengah berkibar, dan kehancuran harta pusaka / lalu terkuburlah sementara // dan patahlah tiang bendera tiga belas kali*”。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³⁶ 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迅速宣布于 5 月 14 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 6 月 24 日授权时任副首相敦阿都拉萨领导国家行动理事会维持社会秩序。详见〈513 暴乱：笼罩大马半世纪的阴影〉，《当今大马》，2019 年 5 月 13 日，<https://pages.malaysiakini.com/may13/zh/>。

³⁷ 原文“*kijang jinak serta-merta tempang.....pelaut tidak sampai ke daratan*”。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这段历史性的再现不仅揭露动荡所带来的破坏力，亦深刻反映其对社会的长远影响。“撕裂现有的纯洁，/刷新邪恶的翅膀，/使所有的渴望和人类之间的爱之湾都变得黑暗。”³⁸此诗句描绘了原有的纯真与和谐被刺穿的景象，邪恶之翼趁势得以滋生，理想与人性之间的温暖逐渐被污染。通过这样的描述，沙末赛益深刻展示这场社会冲突对国家理想和人际关系的侵蚀。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同样揭露 513 的梦魇与创伤。根据其出生年份推断，冲突爆发时其约十岁之龄，足以清晰记得和感受社会剧变。³⁹故其在创作中，不断重返此历史拐点，以创伤叙述重构族群政治的阴影与记忆。

1987 年 10 月，其作〈惊魂〉⁴⁰一诗，虽以吉隆坡秋杰路地区“亚当事件”⁴¹与茅草行动为背景，却可从中清楚看出 513 的影子。诗人并非复述历史细节，而是通过意象描绘集体心理的持续恐惧和敏感，表现历史记忆如何在社会中不断回响。当华社再次陷入政治困境时，诗中直言，513 这刻骨之忆，触景即苏：

三十年来国家，仍是

教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

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

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

³⁸ 原文“*merobek-robek kemurnian yang ada, / menyegarkan sayap durjana, / menghitamkan semua cita-cita, semua teluk cinta antara manusia*”。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³⁹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页 137。

⁴⁰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36-39。

⁴¹ 1987 年 10 月 18 日深夜，一名 23 岁的马来士兵亚当（Adam）手持 M16 步枪，沿街开枪扫射，导致 1 人死亡和多人受伤。此事件被俗称为“蓝波亚当事件”，社会上流传可能会重演 1969 年的 513 事件，导致许多民众不敢上班，商店停业，学生也不敢上学，引发全国轰动。详见〈“蓝波”亚当沿街开枪，为何至今深刻人们记忆？〉，《当今大马》，2021 年 4 月 9 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8/04/12/238993>。

记忆犹新啊那场滂沱

513 的痛苦无可忘却，诗人以“洪水”作为历史隐喻，直指记忆中的 1969 年如何“掠夺无数一文不值的生命”，伤亡数不胜数，然而当时的“黑手”至今“照旧飞扬跋扈的横行”。虽已过良久，但终究在华社乃至全国各族群间，长久留下“一道永不痊愈的疤痕”。诗末，513 的影子再次出现，而这映射出当夜的混乱，为人民带来的不只是生理上无法治愈的痛苦，更深深烙印在人民心中，无法愈合：

有人坐待黎明，有人

漏夜猛敲杂货店的门

或击碎百货公司的玻璃窗

因为一九六九年，据说

有人未及防范，所以饿死……

此段与沙末赛益的描写形成呼应，凸显暴动发生时，平民百姓无辜受累。傅承得强调，国家自独立初期的团结愿景，到后期的狐疑与压抑，始终笼罩在 1969 年的阴影之下。彼时失去的不只是社会安定与生命的逝去，更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与安全感。当类似的族群冲突与暴力再度出现时，仿佛被触发的按钮，唤起这如影随形的历史记忆。⁴²那抹红色与现实再次形成碰撞，人民陷入恐惧之中。

⁴² 1987 年 10 月 17 日，时任巫青团团长 Najib Razak 带领巫青团进行万人大集会，集会中有人将“以华人鲜血染红马来短剑”、“5 月 13 日已开始”等的字眼写在布条上。惟，当 2009 年

隔年 3 月，〈因为我们如此深爱〉⁴³再次提及“513 事件”，进一步呈现当中的个人创伤叙事。诗的第二节，直接带读者回返 1969 年的“现场”：

但我十岁的时候
——那是一九六九年
左邻右舍，只要是同样肤色
带着愤怒和惊惶，带着
木棍与柴刀，聚集
在我家的大厅，传递
孩童听不懂的消息：
‘明天就要开始报复
至少他们也得血洒几滴’
只是小小的心灵，已蒙上
小小的恐惧和阴影

诗人以孩童的目光刻画当下氛围，透过“木棍与柴刀”的细节，揭示 513 如何渗透家庭。孩童虽无法理解大人的话语，却已被恐惧深深笼罩。十岁的傅承得记忆深刻，正因“同样肤色”引发的同仇心理与报复话语，早已为其心灵留下不灭的阴影。这段记忆“仍盘踞心中，不仅挥之不去/且不断成长，似要/

时，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出席国会时，遭到行动党已故全国主席卡巴星询问时，他否认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可是在茅草行动白皮书当中，证实了这句话曾出现在巫青团的大会。详见〈纳吉是否有发表血染短剑论？安华推搪人不在现场不知道〉，《当今大马》2009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06686>。

⁴³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43-46。

吞噬这片美丽土地的上空”。故每逢社会动荡来临，诗人便会回想童年经历，反映出创伤叙事的跨时空延续性。

然傅承得并未止步于创伤的书写。〈因为我们如此深爱〉的“深爱”，既是对土地的情感，也是对未来和平的渴望。人们正因深爱这片“没有台风，没有地震/更无血腥，更无炮声”的土地，所以不愿再度重演悲剧。这一心声与《含羞种子》相互照应。沙末赛益同样未局限于混乱与冲突的描写，而是将叙述延展至对国家建设的期许：“稻田必须金黄，/树脂必须浓稠，/矿石必须无掺杂，人类/必须在这样的土地上感到快乐和幸福”。⁴⁴其将稻谷、胶乳、矿石分别象征农业、工业与能源，代表国家发展的基础，强调唯有真正惠及人民，社会的不公与紧张才可能被削弱，而国家亦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与自由。

第二节 从 513 到茅草行动

五十余年来，“513 事件”的创伤仍深深烙印于社会结构中，却长期被沉默和回避所掩盖。这场上世纪大规模族群冲突，是国家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悲剧，也是民主化进程中始终未能彻底愈合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513 所代表的集体记忆正逐渐模糊，甚至在政治权变中沦为禁忌或被工具化使用。⁴⁵事件真相至今看似尚无定论，然产生的种族矛盾在国家政策与社会现实中不断被固化。巫裔坚持宪法赋予的特殊地位，华族诉求平等权利，印度裔与其他原住民族则在

⁴⁴ 原文“*padi harus menguning, / getah harus pekat, / bijih harus bersih, dan manusia / harus bahagia atas bumi begini*”。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⁴⁵ 江子睿，《对比台湾 228 事件与马来西亚 513 事件抗争过程与后续发展》（台北：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学，2022），页 2。

边缘处艰难发声。⁴⁶利益的拉扯与信任的缺失，使国家陷入团结与分裂、民主与威权的漩涡中。

根据官方报告，“513 事件”造成 196 人遇难，180 人受伤⁴⁷，被视为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族群暴动。⁴⁸官方声明指出，暴动的根源归结为黑社会介入政治的复杂关系（*Kongsi Gelap dan Politik*）、各政党之间的僵局（*Ketegangan Terpimpin*），以及反对党庆祝胜利的游行（*Perarakan Kemenangan*）。然而当柯嘉逊在研究英国档案局的该事件的记录后，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坦言事件的爆发非简单的群体间冲突，而是巫统内部右翼势力对现有权利结构的挑战所引发。

49

沙末赛益在其〈习俗〉（*Resam*）一诗中，曾隐晦地揭示了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凡是最早开始的人/从左侧出发/最终/都不得不站到右侧”。⁵⁰这首类似俳句的四句短诗被解读为带有讽刺意味，暗示那些最初支持左翼的人，最终往往被迫转向右翼，或逐渐被边缘化。⁵¹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左翼可被理解为受旧式英国教育的传统马来贵族，右翼则象征野心勃勃崛起中的新一代马来资本家与官僚阶级。

诗中通过“从左到右”的座位比喻，揭示出一种近乎命定论的政治逻辑。当面对权力与现实的重压，旧有的精英阶层终究被迫退位，而新兴势力则逐渐崭露头角。1960 年代的马来西亚，社会结构性鲜明的左右分化便是此真实写照，

⁴⁶ 江子睿，《对比台湾 228 事件与马来西亚 513 事件抗争过程与后续发展》，页 2。

⁴⁷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Majlis Gerakan Negara; 1969), 97.

⁴⁸ “Negara kita telah menerima paluan yang sehebat-hebatnya pernah dialami meletusnya rusuhan antara kaum.” 详见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iii-iv.

⁴⁹ Kua Kia Soong,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Petaling Jaya: SUARAM KOMUNIKASI, 2007), 8-9.

⁵⁰ 原文 “Siapa yang awal / dari kiri / terpaksa akhir / dari kanan”。摘自 *Resam* 一诗。详见 A. Samad Said, *Benih Semalu*, 17.

⁵¹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2005), 17.

即一端维护既定体系与追求平等，另一端则强调既得利益和马来人至上的资源掌控。贵族在权力角逐中逐渐式微，权力最终集中在新兴派手中。〈习俗〉中所呈现的“从左开始的人，最后却在右边”，与柯嘉逊对 513 政治内涵的解读不谋而合。

柯嘉逊进一步指出，“513 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强烈明确目的性而规划的政治冲突。其主要目的在于推翻当时代表马来贵族阶层的首相东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以便让新兴的官僚阶层能系统性且合法化地掌握国家政权。此次政变，既影响了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也打破马来贵族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地位。⁵²东姑本人亦曾在其晚年的采访中坦诚的表示：

*.....1969 ialah tahun yang terburuk kerana komunis mula membuat kacau dan juga orang-orang saya seperti Razak juga menghadapi masalah. Meraka ingin mengambilalih kuasa. Semua perkara berjalan dengan lancar tetapi meraka tetap memggelarkan saya nyanyuk dan apa-apa sahaja yang tidak sepatutnya.....*⁵³

*.....Harun adalah salah seorang daripadanya—Harun, Mahathir, Ghazali Shafie—semuanya bekerja dengan Razak untuk menyingkirkan saya, untuk mengambilalih tempat saya. Jadi mereka ini semua satu kumpulan.....*⁵⁴

在事件发生后，东姑引咎辞职，由时任副首相敦阿都·拉萨（*Tun Abdul Razak*）接任，并随即推动以巫裔族群利益为发展导向的新经济政策（*NEP*），

⁵² Kua Kia Soong,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3.

⁵³ K.Das, Kua Kia Soong, *Kenangan Tunku*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SIRD), 2003), 123.

⁵⁴ K.Das, Kua Kia Soong, *Kenangan Tunku*, 125.

开启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延续的，以马来人为主的新政治途径。经过此转折点后，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上的不平衡矛盾加剧，进而在 18 年后的 1987 年，再次引发一场令华社陷入恐慌的政治风暴——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这一动荡延续了 513 遗留的种族政策偏差，从跨族群间的冲突，转向针对华社更具体的政治清洗，更隐射国家政权重组合法化之下的深层困境。

茅草行动的起因，是当时华人社会反对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此不合理措施，引起马华等政党联合举行抗议活动。初时，政府并不致以理会，过后才同意协商，而罢课抗议行动也因此取消，却也成了民族冲突的导火线，紧张氛围开始蔓延。同期，巫统青年团举行万人大会，公开谴责马华领导人、董教总和反对党之前定下的协议。与此同时，“亚当事件”的残暴，也是加剧了民族间的不安和敌意。

1987 年 10 月 27 日，时任首相敦马哈迪（*Tun Dr. Mahathir*）以种族间关系紧张为由，展开大逮捕行动，总计 119 人被扣留，其中包括朝野政党领袖、华教人士、环保与社运分子，以及宗教人士等，就连报导此新闻的三大报章，即华文《星洲日报》，英文《星报》（*The Star*），马来文《祖国报》（*Watan*）都被勒令停刊。政府援引《马来西亚内安法令》进行羁押，却始终没能提出证明这些人士危害国家安全的明确证据。

《赶在风雨之前》便是当下的见证书写，真实映照了 1980 年代的雷霆疾雨，记录并再现华社的另一集体记忆与心理创伤。茅草行动将政治斗争再次推至高峰，而这时期华社所面对的，不仅是被边缘化的族群身份，更直接受限于教育权、语言平等及政治参与。

其中，〈删诗〉尤为典型。诗人写道：“据说有人删诗/不是采诗官，更非鲁大臣/常将民族大义挂在口头/精于党同伐异，嘿/马华领袖，他是”。⁵⁵诗中的讽喻、戏谑、抨击一览无遗，写实对象更直接表露。此与马华领袖有关的政治讽刺诗⁵⁶，是典型的史诗式抒发。那流于表面的情感，看似鞭辟入里，实则讽刺过度。⁵⁷诗人藉由“删诗”一事，以嘲讽口气，讽刺批判当时马华政党领袖一步步退让⁵⁸，将华族权益割让，导致华社在关键议题上失去话语权。再者，诗中亦呼应 513：“关于一九六九年/关于五一三”。故“删诗”的比喻，可延伸至历史中被“删除”的族群记忆和创伤。这表明政治的压制，不仅限于当下，也影响着历史叙事的选择和遗忘。

⁵⁵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31。

⁵⁶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吉隆坡：大将事业社，2001），页 106。

⁵⁷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页 106。

⁵⁸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页 106。

第三章 意象的运用

意象，即“意”和“象”，是诗歌中情感与思想的核心承载体。其中“意”指的是人难以量化的情感活动和思维深度。⁵⁹《易经·系辞传上》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若欲表达意，惟“立象以尽意”。⁶⁰所谓“象”，指的是如草木、山川、庭院等，自然与生活中存在的物象。诗人通过融合情感蕴藉和艺术技巧，将有形却未具特殊意义的物象构成意象，赋予其象征性和隐喻性。⁶¹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言：“……玄解之宰，寻神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⁶²诗人通过感物寄情，使意念转为意象，实现独特审美意味。不仅得以唤起读者自身想象与联想，洞察诗人心理状态、生活态度和内心欲望等。自然界规律与人生道路皆可在意象中得到印证与启发。⁶³故意象与人的生活、社会、文化历史有着密切联系。⁶⁴本章将通过数字意象、自然意象和人物意象三方面，探讨傅承得和沙末赛益叙事风格中的共通与区别。

⁵⁹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页 26。

⁶⁰ 苏勇校点，《易经·系辞传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页 80。

⁶¹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页 33。

⁶² 意象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刘勰视意象为神思的基本内涵，作为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的根本，确定了意象在创作中的巨大作用。详见[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 493。

⁶³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页 34-35。

⁶⁴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页 48。

第一节 数字意象

傅承得〈惊魂〉⁶⁵与〈因为我们如此深爱〉⁶⁶两首诗中，皆通过“一九六九年”表达代表族群分裂的“513 事件”。〈删诗〉中更直接指出具体时间点：“关于一九六九年/关于五一三/那段回忆，如此悲惨”。⁶⁷血色与泪水笼罩之夜，是萦绕心头的噩梦，惊扰得无人成眠。“三十年来家国，仍由/不安、狐疑，和欺压/统制每一时美丽的山河”的自白，深刻呈现始终存在的集体心理创伤；“教人透气艰辛的厚重阴霾/笼罩生长于斯的上空”，象征心灵与精神上的长期沉重负担。

阴霾、欺压与不安成为这片土地的常态，“所有的子民，长期/绷紧神经，长期惊疑”。社会的裂痕与政治暴力，让诗人痛惜写道：“我们生长于斯的城邦/但一些情绪开始被玩弄/一些思想开始被污染/一些美好开始被破坏/一些安宁开始被摇晃”。当强权以车轮之势碾过，平静与信任被肆意粉碎，众生皆作蝼蚁之颤，“只是一些感觉开始麻木/一些忠贞开始变质/一些理想开始幻灭/一些热情开始冷却……”，唯有疏离与冷漠守护亦侵蚀残存的生活。

沙末赛益〈希望的种子〉(*Benih Harapan*)一诗亦使用充满象征意义的数字“十三次”(*tiga belas kali*)。诗人通过“旗柱十三摧，鹿温倏跛足——十三劫”⁶⁸的描写，具体表现团结在国家动乱之下的破碎。作为象征国家尊严与统一的旗帜，表面上是人为“折断十三次”，实际暗示社会与民族身份的脆弱与分裂。

⁶⁵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36-39。

⁶⁶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43-46。

⁶⁷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34。

⁶⁸ 原文“*dan patahlah tiang bendera tiga belas kali / kijang jinak serta-merta tempang — tiga belas kali*”。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同时，诗人以“温驯的鹿”代表国民，“骤然跛足”标志人民对政府信任的瓦解，反映族群对国家认同危机。此数字意象清晰指明 1969 年 513 事件。⁶⁹“十三”的屡屡出现，如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不仅体现创伤的轮回循环，也象征民族间持续存在的矛盾，揭示个体与集体的绝望与无力。

再者，诗人亦将数字意象与身体部位结合，创造生动的象征系统。诗中的“六双手”（*enam tangan*）和“三张面孔”（*tiga wajah*）通过数量和身体意象的层叠，指向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群体。“手”承载劳动的意义，标志三种民族在国家发展中的共同责任，展示合作的潜力及分裂和冲突的风险。诗句“这份决心，滴落/于六双汗涔涔却坚定的手”⁷⁰，突显了团结和牺牲的价值，印证国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坚定。同时，“六双手紧密专研/蓝图和所有冀望——身着农民、渔夫和工人之服装——伴随着歌声”，⁷¹清晰表明国家建设依赖于普通劳动群体的支持与参与，确证了政治的关键来自于民众，民心是政治取向。“三张面孔”则象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诗句“三张面庞，共沐同一希冀”⁷²，强调了文化、宗教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描绘了三大族群在国家强大的庇护下，对团结和谐的愿景。这反映诗人对国家认同的期望，展示即使处在矛盾和冲突中，依然有可能通过共同的希望实现某种形式的共存与和解。

⁶⁹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130.

⁷⁰ 原文“*dan keazaman ini dititiskan/atas enam tangan yang berpeluh, tapi teguh*”。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详见 A. Samad Said, *Benih Semalu*, 5.

⁷¹ 原文“*enam tangan erat meneliti / rancangan dan segala doa — dengan pakaian tani, nelayan dan buruh — dan nyanyian*”。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详见 A. Samad Said, *Benih Semalu*, 6.

⁷² 原文“*Tiga wajah di bawah harapan yang satu*”。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

傅承得在辑二〈精神病患手记〉⁷³中，以编号形式组织诗歌结构⁷⁴，透过数字展现“精神病患”碎裂而错乱的意识世界，传达个体精神的压抑。编号中隐藏茅草行动前后的日期，既是理性化的冷漠记录，又是难以言表的痛苦痕迹。与 513 相比，1987 年茅草行动对华社的威慑更深。此举通过“杀一儆百”，全面压制言论与政治表达，社会弥漫着集体恐惧的氛围。⁷⁵人民被迫噤声，失去讨论政治事务的自由，揭示国家权力对公民社会的全面钳制。⁷⁶在听政客演讲的“我”，当被讥讽为“麻木不仁的疯子”后便真的疯了起来，“我每天总要找找老马 / 摊开报章或杂志 / 谈时势与国事 / 不然，就臭味相投”。此转折显现在政治迫使与媒体话语操控下，正常公民陷入病态的现实。⁷⁷诗尾刻画了“我”对老马的身体和语言攻击的幻想，将被压抑的愤怒化作疯狂叙述，显示被长期压制的主体在精神错乱中释放反抗。故诗题的“精神病患”实质隐喻在不公不义体制下逐渐失常的民众群体。⁷⁸

这些数字也承载身份认同的焦虑。诗人以数字取代姓名，如“编号八六零九一五”、“编号八六一零零四”、“编号八七一一零一”等，象征身份的剥夺，将个人创伤与集体历史记忆紧密交织。再者，诗人通过数字与内容的反差营造反讽，如将编号与“精彩的政论”并置，揭露政治话语的虚伪性；与“丢了嘴”、“砍头”等身体破碎意象结合，揭示体制暴力不仅烙印于数字，也摧残肉身；与“大汉”、“陶渊明”等文化符号并行，折射华社在霸权下的身份困境。这些

⁷³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68-73。

⁷⁴ 叶福炎，〈语言、认同与国家：一九七二年“文化回归”争论及马华现代诗写作问题〉，《文史浮罗：东南亚文学、文化与历史论文集》（中山：国立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22），页 141。

⁷⁵ 陈大为，〈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页 12。

⁷⁶ K.Das, Kua Kia Soong, *Kenangan Tunku*, 141.

⁷⁷ 叶福炎，〈语言、认同与国家：一九七二年“文化回归”争论及马华现代诗写作问题〉，页 141-142。

⁷⁸ 叶福炎，〈语言、认同与国家：一九七二年“文化回归”争论及马华现代诗写作问题〉，页 142。

意象汇聚成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批判，既见证机制暴力，也是历史的沉默，同时解构“正常社会”的荒谬性。

第二节 自然意象

雨意象自《诗经》起为中国诗词最古老且持久的主题之一，常用于文学指代外部动荡与内心忧虑。傅承得在《赶在风雨之前》中赋予其鲜明的时代政治内涵。“雨”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是 1980 年代我国政治风暴和冲突爆发的直接隐喻，象征政治局势的黑暗与华族困境。其中和“雨”相关的意象被反复运用，如“风雨”、“濠雨”、“夜雨”，暗示不安的政治处境和紧张的社会氛围，正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诗人以“赶在风雨之前”为题，突显风雨将至却无力回避的焦虑，折射华社在不平等政策与高压管控下的忧虑、惊恐、失望。⁷⁹

“风雨”作为诗集核心象征，将时代的政治压抑与文化危机具象化，是政治现实的写照。⁸⁰民办华文大学理想受挫、三保山事件、官方机密法令的推行、合作社风暴、新教育法令、华小高职事件，及 1987 年茅草行动，皆如风狂雨骤，为华社带来惊悚与悲痛⁸¹，感时忧国的情怀弥漫全诗。故“风雨”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突显华社困境，更化为昔时华族的集体经验和历史记忆，成为一代人对不公社会处境的见证。

⁷⁹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 288。

⁸⁰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页 109。

⁸¹ 戴小华，〈倾听马来西亚——《当代马华文存》总序〉，陈亚才主编，《当代马华文存·政治卷·80 年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页 vi。

〈濠雨岁月〉写于 1987 年 10 月⁸²，其背景为“华小高职事件”⁸³引发的社会震荡。此措施被视为对华文教育体系的威胁。华语不仅是语言传承，更是精神信仰与文化根基。若由外族教管，其正确性和延续性难以保障，还可能因误导而逐渐消失忘却，导致华小逐渐丧失其独特性与本质。当时华社以全国罢课的集体行动，坚决表明反对和愤怒的立场。诗人多次运用“走在雨中”的书写华教危机，以及对民族文化教育前景的忡忡忧心。⁸⁴那弥漫的沉重与压抑，“竟有刀俎间鱼肉的悲哀”。

“睡不安寝，食不知味”的氛围，突显华社为争取权益的战战兢兢，“怕一麻木丢失了自己”。面对大逮捕镇压，华族“有时却得糊涂，作哑装聋”，但仍时刻警戒着，却又“怕过于绷紧，必定错乱神经”。精神濒临崩溃之下，“惟有任随它下/闪电闭目，打雷掩耳/霪滂撑伞；没伞，则听淋”。诗末“明天，会不会阳光普照/温热的泪，会不会转冷/月如，我真的，真的不晓得”，不仅表达诗人深切的无力感，更折射华社在黑暗笼罩下，对未来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运的茫然。

〈夜雨〉⁸⁵以讽喻手法呈现政治黑暗的延续。“夜”代表“黑暗”，“雨”则为“困境”，两者构成“夜雨”，隐喻当时的政局。诗中描写华人政客在选举期间以华人利益作当选工具，暴露其唯利是图的自私心理。“趁选举，一切都便利/收买人心不必本钱”，写实政客以虚假且无需任何本钱的承诺收买民心。

⁸²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18-19。

⁸³ “华小高职事件”又称“八七年杪华小罢课”事件，是指在 1987 年 8 月时，教育部打算将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到华小担任学校行政高职。这些高职包括校长、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下午班主任以及课外活动主任。这项措施引起华社激烈反对，认为会影响学校的行政语文和校园文化，最后将导致华小变质。当时华社甚至不惜以“全国华小罢课”的行动来证明华族不满和愤怒的立场。详见王瑞国，〈华小高职事件〉，《董总 50 年特刊》，2012 年 2 月 29 日。

⁸⁴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巴生：漫延书房，2009），页 133。

⁸⁵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20-30。

“多批几块地皮，老弟/政治便有了资本//他给五百，你出一千”，则揭示国家资源被肆意挪用的黑暗现实。政治资本来源是以拍卖形式出售国家地皮，发展商你争我夺不断抬价，而政客藉此积累政治与经济利益。

“那龙椅，嘿，有个聚宝盆/十万栢钱，只属等闲”，则表示政客们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就如坐上龙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有掌权，方能攫取资源与财富。这种自私心理无异将导致国家沦落，民族更加悲哀。“夜雨”亦有茫然朦胧之意，如夜行者在雨中看不清方向，华族也无法分辨伸向自己的是援手或黑手，是善意或敌意。这种迷惘展现华社在现实政治中的脆弱与被动。诗句“多少假相，多少虚名/悠然不止啊绵绵夜雨”更点明局势暗流汹涌，危机四起，而华族步步为营只为寻得真正的庇护所，小心试探以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相较于傅承得以“雨”象征一系列政治危机，沙末赛益则借用“植物”暗喻社会状态。其诗歌强调和谐宁静，以温暖、宽容的目光观察所处的环境。这正如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中和”理性，以敦厚协调自然与人的情感，以柔和化解矛盾。⁸⁶《含羞种子》由《希望的种子》和《含羞草叶与野蕨心》两部诗集构成，既是书名，也是小诗。诗人将“种子（*Benih*）”、“含羞草（*Daun Semalu*）”和“野蕨心（*Pucuk Paku*）”三种植物并置为核心意象，寄托其对生命与社会的憧憬。

“种子”象征新生与潜能，承载着希望的原始形态。作为孕育未来的起点，种子暗示社会更迭与集体觉醒，即使在压迫的环境中，生命仍具备生根发芽的机会。诗人通过“希望的种子”寄托社会中潜在的重生力量，暗示人民在经历殖民统治、独立风波、“513 事件”等一系列创伤后，仍能凭借坚守国家原则

⁸⁶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页 183。

（*Rukun Negara*）而保持内在活力。⁸⁷正如学者言：“种子不仅代表希望，更是生命奋斗的体现，承载着生存、成长与重生的意义，象征民族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⁸⁸诗中对未来的期待，揭露诗人对“国族于树荫下共盼荣光，笑语至暮，再无虚妄”⁸⁹的坚信。

“含羞草”映现另一种温和又坚韧的生存姿态。其“触动即闭合”的自然特性，恰好隐喻群体在高压社会下的敏锐感知。这非软弱退缩，而是自我保护的生存智慧，将被压制的反抗意识隐匿并静待绽放。此意象内涵通过“野蕨心”深化呼应。作为生长于阴湿环境中的野性力量，顽强的生命力使其即便身处阴影，依旧不断向上生长。这强调了在制度压迫下，边缘化族群及文化宁折不弯的存活模式，铭记惨痛历史的同时在困境中探寻缝隙，在黑暗中多向分化。⁹⁰三种植物形成互文，共同建构从萌芽到共生的意识，体现社会在逆境中的信念感。

〈在田塍上〉（*Permatang*）⁹¹一诗则通过乡村田园的描写，呈现政策之下的深层矛盾。诗中“河流（*sungai*）”、“水田（*sawah*）”、“田埂（*permatang*）”、“黄昏（*senja*）”等乡土符号，原是丰收与生机的象征，却因“寂静（*sepi*）”、“遥远（*sayup*）”、“寂寞（*sunyi*）”的点缀，转化为荒凉和失落的景观。此强烈反差揭示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处境。1971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P）⁹²虽旨在缩小城乡及族群间的差距，但诗中的萧瑟却

⁸⁷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130.

⁸⁸ Siti Hajar binti Zainuddin, “Kajian Semiotik Dalam Puisi Benih Harapan Karya A.Samad Said: Pendekatan Teori Semiotik” (BA diss.,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2021), 1-76.

⁸⁹ 原文“Tiga wajah di bawah harapan yang satu, / berlung di bawah pohon subur yang rendang, / di tepi kijing mesra menanduk-nanduk manja, / dan hilai ketawa juga . sampai ke senja”。摘自 *Benih Harapan* 一诗。详见 A. Samad Said, *Benih Semalu*, 6-7.

⁹⁰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161.

⁹¹ A.Samad Said, *Benih Semalu*, 57.

⁹² 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是国家自 1971 年实施的一项长期经济政策，旨在通过支持土著（Bumiputera）经济发展缩小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虽然该政策成功培育土

展现理念与现实的落差。农村并未因政策受益，反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青年人口大量外流，社区失去活力。诗人反复借助“寂静失落”的心情，彰显在国家政策中被忽视群体的境遇，反思国家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人物意象

在〈赶在风雨之前〉一辑的十首诗中，傅承得在其中七首，即〈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浴火的前身〉、〈山雨欲来〉、〈濠雨岁月〉、〈写给将来的儿子〉、〈因为我们如此深爱〉、〈长夜未旦〉，以抒情笔调塑造人物意象“月如”⁹³，是其袒露心声的最忠实听者。诗人借这位名为“月如”⁹⁴的女子诉说内心的焦虑疑惧和悲愤不满，由此实现自我警醒，也勉励他人应对危难时刻。⁹⁵此皎月般圆满美好之名，隐含国家公平对待子民的祈求，正如月光毫无偏见普照大地。故“月如”不仅寄托个人情感，更是诗人理想中“美好国土”的化身，象征风雨飘摇中沉默呐喊的华族。⁹⁶

〈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⁹⁷开篇即以“月如”作为倾诉对象，诉说惆怅悲愤的同时，表达诗人对国家善待华社的期盼。诗的第二和第三节更点出华人身

著中产阶层，但由于固打制和优惠政策的实施，其他族群感到被边缘化，引发人才外流和外资减少等问题。尽管后来多次调整和延续，其核心机制至今仍对国家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详见〈新经济模式-任重道远〉，巴生中华总商会，2010年4月5日，<https://www.kccci.org.my/zh/our-services/sme-help-desk/topics/new-economic-model>。

⁹³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页104。详见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

⁹⁴ 学界长期探究“月如”身份原型，而陈湘琳曾提出一种可能性：“在他的诗歌代表作《赶在风雨之前》中，有他妻子”娟”的化身“月如”，作为他话语的受众，在愤慨的政治批判中起着抒情的缓和作用”。从字的结构分析，“月如”与“娟”相互呼应，可被视为妻子的象征。作为傅承得最亲密且值得信赖的伴侣，妻子成为他倾诉内心情感与挣扎的对象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引自傅承得，《分明：傅承得散文自选集（一九八五至二〇一〇）》（台北：秀威出版社，2011），页8。

⁹⁵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288。

⁹⁶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288。

⁹⁷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4-5。

处政治风暴旋涡的绝望与无力感，这不仅是历史伤痛，更是当下仍未消解的困境。谁也无法预知在未来时空的家国是否能黑白分明，而华社是否成功争取属于自己的民族权益。“月如，我会用我的健笔/连着心，记录与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的自白，点出文字的保存功能。因为深爱这片土地，所以“我们总得留下”。唯有带着“责之切”的心情，将对华社困境所有的不满与抗议化为文字，连同以结疤的历史痕迹如实记载，让后代学习、记取和反思。⁹⁸虽乌云遮蔽，但诗人坚信只要坚持下去，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重现光明与希望。

在〈山雨欲来〉中⁹⁹，诗人与“月如”相互映照，“月如”的惊悸即诗人内心的折射。¹⁰⁰面对“月如”婉转的哀怨，其仍无畏迎向风雨：“明知山雨欲来/我仍得上路，仍须跋涉/情势，不让我们有所选择/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全诗运用大量短句、断句和押韵，营造强烈节奏感，渲染出沉重而压抑的氛围。¹⁰¹通过“明知山雨欲来/陷阱热忱的招手，危险/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这趟旅程，我坚持要走”的誓言，展现危机中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透过对“月如”的倾诉，诗人亦抒发华族“呻吟破碎的身世”的忧虑，揭示国家对华人贡献的忽视与遗忘，如“蚁虫会筑起巨穴/嘲弄我们付出的血汗”，直指华社的付出与牺牲未获应有的认可。¹⁰²然而诗人并未消极等待，而是以“走入风雨，走出历史”的态度强调文化延续的责任。在压抑奋起中，寄托似满月般的公正理想，期盼国家公平照耀所有公民。

⁹⁸ 潘碧华主编，《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9），页174。

⁹⁹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13-17。

¹⁰⁰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页105。

¹⁰¹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288。

¹⁰²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页289。

作为女性聆听者的“月如”，是“他者”叙述的中介¹⁰³，以感性形象显现情感，缓解政治诗的尖锐性，增强抒情氛围。诗人可自由切换时政评论与文人抒情间，回归叙述主题的内心世界，以更柔和、抽象和细腻的心理描绘。¹⁰⁴然而诗人并未放弃对社会的批判，如〈夜雨〉¹⁰⁵以讽刺戏谑手法，揭示政客们沉迷温柔乡却高喊“党才是大前提”的荒谬，营造一种近乎“嘉年华”的政治表演氛围¹⁰⁶；〈删诗〉以“据说有人删诗 / 不懂节奏，不谙结构 / 却精研政治风向和气候 / 留下安全的内容 / 精神焕发的将伟大歌颂”¹⁰⁷隐喻自我审查与歌功颂德，语言简练而犀利直指问题核心¹⁰⁸；〈浴火的前身〉“纵使无剑，也要高举双拳 / 紧握，教噼啪的火光四迸”¹⁰⁹诗句则展现煽动性的激情，直面抨击政权的黑暗与社会的不公¹¹⁰，体现政治诗在抒情与抗议间的进退。

《含羞种子》中的〈真理〉(*Kebenaran*)将抽象的“真理”拟人化，象征历经风霜而不屈的国族。“每个真理/无论受到压制/依然蔓延/无需施肥/依然绽放/即使没有空气/依然新鲜。”¹¹¹不仅映现国民顽强的生长力，也突显其面对政治压迫时的韧性。诗中亦暗喻政客视权力和私利至上，企图通过机制与媒体操控限制人民的思想，但却无疾而终。“真理“仍在裂缝中蔓延，如在贫瘠土壤中扎根的树木，喻示人民在逆境中守护尊严和信仰的坚毅。¹¹²尽管政客们不断制

¹⁰³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页 137。

¹⁰⁴ 陈大为，〈一个文人的战争——论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的思维结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 10 月号总第 322 期，页 70-77。

¹⁰⁵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20-30。

¹⁰⁶ 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2009），页 105。

¹⁰⁷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32-33。

¹⁰⁸ 陈大为，〈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页 15。

¹⁰⁹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页 9。

¹¹⁰ 陈大为，〈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页 16。

¹¹¹ 原文“*Siapa yang benar / betapa ditekan / tetap menjalar, / tanpa dibaja, / kan tetap mekar, / tanpa udar pun / kan tetap segar.*”。摘自 *Kebenaran* 一诗。详见 A. Samad Said, *Benih Semalu*, 12.

¹¹² Dharmawijaya, “kata pengantar”,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xx.

造虚假与幻象，试图掩盖真实的声音，但“真理”凭借其高贵永恒的价值，在历史长河中决然绽放，代表抵御暴力与虚伪的精神力量。¹¹³

〈与人民同在〉（*Bersama Rakyat*）¹¹⁴一诗则揭露幻象与现实的反差。少年因领袖躺在草地吟诗而赞其“人民化”；长者冷静指出，无论是朗诵无数诗篇或短暂与人民共同劳动，也无法证明何谓“人民领袖”。唯有透过任期时乡城民生的现状，才能理性评判领袖真伪。诗中人物对比鲜明：少年象征涉世未深的群体，而长辈老于世故具备成熟判断力，领袖形象则反映表演与政绩的虚饰。1970年代的政坛上确实有政治人物通过诵读“发展诗歌”塑造亲民形象¹¹⁵，有人感动有人质疑，但现实却是从未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和族群矛盾等国家内在问题。故诗人通过对照描写，显示矛盾和刻画本质，阐明“政治表演”与“社会现实”的悬殊，直白提醒人民必须从政策与施政中洞察真正的人民性，而非被短暂的文化表演所迷惑。¹¹⁶

¹¹³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137.

¹¹⁴ A. Samad Said, *Benih Semalu*, 16.

¹¹⁵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132.

¹¹⁶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132.

第四章 结语

傅承得与沙末赛益作为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政治抒情诗的代表，皆以小诗形式，反映马来西亚多元社会在历史风雨中的复杂情感和政治现实。本文通过比较《赶在风雨之前》和《含羞种子》（*Benih Semalu*）两部诗集，揭示两位诗人在不同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下，如何通过诗歌重构集体历史记忆，并运用意象批判社会不公，深切述说对国家未来的期冀。

《赶在风雨之前》是 1980 年代马华诗坛最具代表性的诗集之一，深刻记载当代政治氛围与社会心态的文学里程碑。此诗集以抽象氛围与浅白明朗的语言，结合多层次意象建构，将 80 年代的关键历史事件化为具文学性的文字见证，展现华社在政治高压下的焦灼与抵抗。“风雨”此核心意象涵盖华教危机、族群权益受限、国家权力压迫等议题，既映照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反射族群对未来的渴望和不屈。“月如”意象则是理想国家的精神象征。既承载诗人对现实不公的感怀与痛楚，也代表群体对平等及尊严的追求，从而实现私情与公共政批的高度交织与平衡。此写作策略使《赶在风雨之前》成为华社集体记忆的艺术形式存档，突显其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价值。

相较之下，沙末赛益更倾向于通过隐晦和象征手法反思社会现实。“种子”、“含羞草”、“野蕨心”三种核心植物意象的运用，不仅展显民族的朝气和新生，也表露国民在窒息环境中的坚毅。其诗歌语言冷静且富有哲理，特别在描绘“513 事件”等敏感历史痕迹时，以间接和隐喻的写法呈现国族创伤，避免坦率直当的控诉，但也不乏对权力结构和社会矛盾的批判。诚然，前者的诗歌具有

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强调华社心中从未消散愈合的恐惧和伤疤；后者则更注重国家框架下的宏观叙事，风格内敛且象征性强。此区别不仅源于个人书写风格，更深刻反映两大族群在国家建设中不同的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

诗风的差异却未能阻挡两者之间的社会共识。两位诗人皆透过建构个人与集体记忆，视诗歌为历史载体，挑战官方叙事的单一化，赋予族群剖白的合法性。同时，意象系统如数字、自然元素和人物形象的应用，让诗人可隐晦又直接地陈述政治情感和批判意识，使诗歌深具美学内涵，也带有强烈的现实震撼感。两者诗作均诠释了深厚的伦理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不仅折射现实，亦试图介入现实，展现文学与政治的对话中何以传递民族价值、凝聚自我认同。

然而，从诗学批评视角而言，傅承得与沙末赛益的诗歌在史诗互证和情感表达方面展示丰富的内涵，但在艺术层面上仍显不足。通过对比，傅承得作品虽以语言直白见长，却高度反复使用“风雨”、“夜”、“风云”等意象，导致指向过于单一。不仅全作感伤氛围浓厚，也伴随着对国家机制的强烈愤恨情绪，从而削弱诗歌本应有的隐喻感。再者，诗人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压迫者—受害者”的对立架构。无论是再现后 513 的集体创伤，或是呈现茅草行动前后的政治氛围时，都侧重于书写华族自身的伤痕经验，忽略了更宏观的历史意识。这种表达策略在加强政治抒情诗的控诉功能的同时，也限制了其思想深度的拓展。若其可更坦然地直面历史，并从中提炼正面启发，或更能突破单纯的民族特殊主义，生成更具普遍价值的文学力量。

沙末赛益的诗歌则直视历史，并展望未来愿景。从描绘国家在殖民时期的无助与挑战，以及随后的社会政治动荡，诗人的写作呈现出国民逐渐克服历史创伤。然而，如此直接与历史和政治互动的诗篇并不多，尤以〈希望的种子〉

和〈与人民同在〉最具代表性。同时，其诗歌中多融入植物意象，刻画乡村生活和童年回忆，通过细腻的描述对社会动荡的批判。尽管此温情而浪漫的美学手法为其诗作增添色彩，但也弱化对权力动态和国家机制的明确叙事。再者，因其抽象和过于隐晦的表达，个别诗歌的本意与背景未能完整传达，致使在信息和批判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故两位诗人在表现手法和美学策略上的差异，反映了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在面对共同的历史记忆时，所展现的不同态度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专书

1.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2. 陈庆辉,《中国诗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3. 傅承得,《分明:傅承得散文自选集(一九八五至二〇一〇)》,台北:秀威出版社,2011。
4. 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88。
5. 潘碧华主编,《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9。
6. 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7. 苏勇校点,《易经·系辞传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8.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巴生:漫延书房,2009。
10.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11. 曾荣盛,《沙末赛益·马来西亚文学大师》,吉隆坡:馨艺苑,2016。
12.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3. 张光达,《风雨中的一枝笔》,吉隆坡:大将事业社,2001。

14. 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2009。
15. A.Samad Said, *Antara Bulan dan Wira: Edisi Khas Sasterawan Negar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2.
16. A.Samad Said, *Benih Semal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87.
17. Dharmawijaya, *A. Samad Said: Sebuah Antologi Puisi yang Menghimpunkan Karya-karya Selama Lebih Setengah Abad*, Kuala Lumpur: Utusan Publications & Distributors, 2005.
18. K.Das, Kua Kia Soong, *Kenangan Tunku*,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SIRD), 2003.
19. Kua Kia Soong,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Petaling Jaya: SUARAM KOMUNIKASI, 2007.
20. Majlis Gerakan Negara, *A Report: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Majlis Gerakan Negara; 1969.

专书（古籍）

1. [南朝梁]刘勰著,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专章

1. 陈平原,〈如何进入历史〉,《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页61-67。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9。

2. 戴小华,〈倾听马来西亚——《当代马华文存》总序〉,陈亚才主编,《当代马华文存·政治卷·80年代》,页 i-vii。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
3. 叶福炎,〈语言、认同与国家:一九七二年“文化回归”争论及马华现代诗写作问题〉,《文史浮罗:东南亚文学、文化与历史论文集》,页 127-146。中山:国立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2022。
4. 曾维龙,〈政治抒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马华文学十四讲》,页 105-120。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译著

1.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 赛·胡先·阿里著、赖顺吉译,《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0。

期刊论文

1. 陈大为,〈赶在风雨之前——论傅承得政治抒情诗的思维结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页 12-18。
2. 陈大为,〈一个文人的战争——论傅承得“赶在风雨之前”的思维结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0月号总第322期,页 70-77。

3. 李树枝,〈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页134-140。
4. 王宁,〈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页1-12。
5. 王昌忠,〈诗歌政治写作的合理路向〉,《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页163-168。

新闻或杂志文章

1. 王瑞国,〈华小高职事件〉,《董总50年特刊》,2012年2月29日。
<https://www.dongzong.my/resource/shortage-literature-n-information/1096-shortage-1>。

学位论文

1. 江子睿,《对比台湾228事件与马来西亚513事件抗争过程与后续发展》,台北: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学,2022。
2. Siti Hajar binti Zainuddin. “*Kajian Semiotik Dalam Puisi Benih Harapan Karya A.Samad Said: Pendekatan Teori Semiotik*” BA diss.,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2021.

网络资料

1. 巴生中华总商会, 〈新经济模式-任重而道远〉, 2010 年 4 月 5 日,
<https://www.kccci.org.my/zh/our-services/sme-help-desk/topics/new-economic-model>。
2. 《当今大马》, 〈513 暴乱: 笼罩大马半世纪的阴影〉, 2019 年 5 月 13 日,
<https://pages.malaysiakini.com/may13/zh/>。
3. 《当今大马》, 〈“蓝波” 亚当沿街开枪, 为何至今深刻人们记忆? 〉,
2021 年 4 月 9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8/04/12/238993>。
4. 《当今大马》, 〈纳吉是否有发表血染短剑论? 安华推搪人不在现场不知道〉, 2009 年 6 月 17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06686>。